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6.002

从《实践论》和《矛盾论》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刘永凌¹, 李文²

(1.山东社会科学院 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山东 济南 250002;2.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对于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实践的角度而言,实践的现实需要是区别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根本标准,传统文化不存在抽象意义上的好与坏,也只有在实践过程中,才能建构起文化自觉前提下的“文化免疫”。从矛盾的角度而言,应辩证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统一关系,统一性是矛盾主要方面,对立性是矛盾次要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应努力超越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特殊性”界限,建构具有世界“普遍性”意义的新生活样态,以此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在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实践论》;《矛盾论》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6-0011-08

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对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方法论指引。特别是“两论”中所强调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把握矛盾的主次方面以及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相互转化的原理对于理解二者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 “文化自觉”到“文化免疫”:实践中需要辩证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所指的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这可以说是学界的共识,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区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这是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一个前提性问题。然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学者们就见仁见智了。一些学者倾向于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中抽离出一些优秀的思想元素和价值理念加以强调和标识,笔

者认为这一认知倾向值得商榷。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区分精华与糟粕就不容易,不是简单地说这个东西好、那个东西不好就完事,更不是找一些看起来眼熟的‘元素’点缀一下就算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了”^①。在如何区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这一问题上,我们不应该以一个旁观者的高姿态对传统加以主观的评判和裁剪,因为这并不是一个纯理论的思辨问题,而是一个现实实践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堆可以随意拆卸和搭配的积木,可以凭借自己的体悟机械地增添或者拆除,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口袋里的马铃薯”,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某时某地精华的东西,在彼时彼地就可能成为消极的东西,反之亦然。如果我们在头脑中在书斋里人为地裁剪出所谓的好和所谓的坏,这似乎重蹈了五四时期激进的知识分子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做法。正如杜维明

收稿日期:2020-07-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KS023)

作者简介:刘永凌(1972—),女,山东莱西人,副编审,主要从事儒家文化和地域文化研究。

^①于涓,余双好:《从文化建设的视角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顾问、武汉大学教授陶德麟》,《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4期。

在回顾五四运动时所指出的：“不过这些人可能过于乐观，他们认为通过批判，将中国传统的糟粕彻底地消除，中华民族就可以在新的时代、新的平台上向西方学习了。这里的困难在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我们不能把它看成一个静态的结构，应该把它看成一个动态的过程。”^①也正如毛泽东在论及五四运动本身的缺点时指出的那样：“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②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并不在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常道，也不在于传统的所谓超稳定结构，而恰恰取决于传统的流变性，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传统。传统又是如此的吊诡，在传承和发展的实践中，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和消极因素都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一定程度而言，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甚至具有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因为真正的传统并不是停留在典籍中的概念和范畴，而是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情感认知中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倾向性，这种倾向性的影响是潜在无形的，生活于社会机体中的个体在无意识中就已经不自觉地受到传统的影响，从而使得个体的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也兼具了这种倾向性的特质。

那么，如何区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呢？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不妨回到毛泽东的思想中。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③从这一角度而言，现实的社会实践才是区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和糟粕的标准，而不是个别理论家

在书斋里的纯思。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指出：“判定认识或者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④回顾历史，毛泽东在阐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时，更多地是强调基本的立场和原则，并没有加以具体地区分和列举。这显然不是毛泽东本人的理论疏忽，更不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体悟不够，而恰恰证明了毛泽东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审慎态度，即坚持从现实的实践需要出发，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传统。任何主观地划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都是非历史的、非辩证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⑤我们经常引用毛泽东这段话的前部分，而对于最后一句话似乎重视不够，毛泽东强调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并不是发古之忧思，而是有着明确的现实实践取向，是为了指导当时的伟大革命运动。在革命战争年代，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为了这一目的，“只要不是直接地影响和干扰农民的革命激情和实践，只要有利于这样的激情和实践，孔儒的东西照样应拿来运用和发展。且不说孔儒关于办学、人格气节这样一些主张，就是毛泽东最为痛恶的忠孝仁义这样的道德观念，他也多次进行改造和发挥，从而引申出新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意义”^⑥。1939年，毛泽东在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中，就从革命的现实实际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仁勇”进行了新的阐释和转化。毛泽东说道：“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

①杜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江海学刊》2011年第3期。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1—83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⑥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页。

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的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①可以说,从现实的实践需要出发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爱国精神、大同理想、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好战必亡等传统价值理念,其价值理念都有新时代的明确问题指向,也都是立足于现实实际需要的基础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

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这一问题上,我们不妨学学鲁迅的拿来主义。首先我们要敢于拿来,不能当“孱头”,不敢拿;也不能当“混蛋”,拿来之后不管好坏付之一炬;更不能当“废物”,欣欣然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我们应有的态度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拿来”,在实践过程中再加以批判吸收,在实践中为我所用。正如鲁迅强调的:“先占有,再挑选。”看见鱼翅确有营养,可以当食物一样吃掉;看见鸦片也不必摔在茅厕里,可以送到药房里去供治病之用;看见烟枪和烟灯送一点进博物馆,其余的大可以毁掉。在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封建特权思想、官僚主义思想、“宗法观念”和“家长制”等消极因素难免会同时发生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承认这个事实丝毫无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传承。如果我们怀着美好的意愿在纯思的理论层面对传统文化加以划分和取舍,那样只能是理论上可能说得通,而实践上则做不到。这里似乎存在一个矛盾,这也正是传统的吊诡之处,要学习传统文化才能传承和发展,但是在学习过程中又难免会受到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影响或者反噬。那么,如何应对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反噬?对待传统的这种反噬,我们应该理性地认识,在实践中形成对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自我免疫”。换言之,要免疫就不得不接触病毒,要在免疫中实现真正的传承。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方面,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观点,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要有一个理性的自觉认识,知道他的来龙去脉,知道他的优点和不足。在现实实践中批判性地吸收和发扬传统的优点,同时又对传统的不足保持高度的警惕,避免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受到传统消极因素的影响,以此来达到一种对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免疫状态。这种免疫状态自然不是对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一味排斥,而是与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一种共生状态。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有时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精华中有时潜藏着糟粕的东西,糟粕中也许蕴涵着一些精华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在继承传统中存在反噬的原因之所在。因此,在区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这一问题上,我们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殊性”^②。正所谓“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如果说文化自觉是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之上的理性体悟,那么“文化免疫”就是建立在生存论基础之上的实践检验。值得强调的是,以现实的实践需要作为检验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标准,并不是拒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认知。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的那样:“这些知识在古人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③也就是说,已经被前人的实践经验所证实的科学认识无疑是可靠的,诸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具有确定性的封建糟粕和消极因素,我们肯定是需要加以坚决拒斥的。这些具有确定性的封建糟粕和消极因素之所以具有确定性,也是因为现实实践中被反复证明是有害的。但是,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方面,单单具备理性的文化自觉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文化自觉的前提下,在现实的实践中建构起对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自我免疫。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如同一颗药丸,药丸

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8页。

既是药,总是会有副作用的,这不是我们主观想避免就能避免的,我们要做的是应该建立起对药丸的理性自觉,在实践中把药丸的副作用控制在合理范围。那么,如何建立起对药丸的科学理性认知呢?这同样不是一个纯思的理论问题,这同样需要在现实实践中加以验证。我们强调对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自我免疫,这种自我免疫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一种良性共生状态,如同病毒之于人体,只有在经历了短暂的阵痛等排异反应之后,才有可能获得针对病毒的“抗体”,由此也才能真正建构起对病毒的免疫状态。

二 融通与互动:矛盾规律要求辩证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①毋庸置疑,科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我们应坚持“辩证法的见解”,努力克服“形而上学的见解”。“所谓形而上学的或者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②那么,如何辩证把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呢?辩证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关键是要摆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位置关系。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在两者关系中处于指导地位,这一指导地位不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为两者的结合提供立场、观点和方法论指导,更决定了两者结合的性质和方向。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就其理论旨趣和方向而言,是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绝不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儒家化”,更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儒化共产党,儒化社会主

义。可以说,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辩证把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根本。值得强调的是,辩证理解两者的关系问题,还应该把两者放在同一个文化层级加以理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文化形态。如果我们只看到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意义,而轻视、忽视甚至无视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结合,这显然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时也是与历史实际不符的。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文化政治问题,我们应该从政治的高度去理解文化,也要从文化的高度去理解政治。就文化形态而言,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谁决定谁、谁支配谁的问题,我们应该摆脱一种主客二元主义观点的束缚。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并不是具有支配地位的一方对被支配地位一方的批判性消化吸收,通过这一批判性消化吸收的过程,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不是说要“以马释中”,以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理论去重释传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格义的功夫,也不是让中国传统文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注脚,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话语”或者“范畴”去比附马克思主义,而是强调一种彼此都以对方为自己现状的必然条件的互动关系,即两者互为对方的时代和思想场域。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言:“一种文化传到另外一种文化环境之中,往往一方面是原有文化会因受到外来文化的刺激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外来文化也要适应原有文化的某些要求(特性)而有所变形”,所以“在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相遇过程中,文化的发展就有一个双向选择的问题”^④。

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背景,必须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要让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话,同时也让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提供思想资源。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无疑存在许多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的东西,这些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④汤一介:《传承文化命脉 推动文化创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4期。

东西则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能离开马克思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和文化场域吗?笔者认为没有办法绕开的,也许有学者并不认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唯物主义认知范式,对“以马释中”的做法也颇有微词,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学术层面加以辨析和讨论。但是笔者想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不可能绕开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在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度融合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时代发展,除此之外别无他路。新儒家历经三代,孜孜以求传统文化的“返本”和“开新”,不论在理论还是现实层面都没能彻底解决好“返本”与“开新”的关系问题。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不可能凭借新儒家的理论致思逻辑实现时代的“出场”。暂不论新儒家在理论层面如何解决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问题,从实践的角度而言,新儒家的根本缺陷倒不在于其理论的自身局限性,而在于其整个理论缺乏社会根基。换言之,新儒家整个理论基调仍然是一种“贵族精神”的逻辑,因而缺乏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主义关照,从而导致其理论缺少“社会根性”。正如有学者指出:“传统儒家之解体固有其观念上的原因,但是不能否认制度的变替是导致儒家失去其安身立命之所在之真正原因。在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治国方针,决定着国家的政治体制,制约着国家发展的方针政策,儒学现代化需要马克思主义提供政治合法性以及先进的现代性理论资源,儒学需要得到社会制度层面上的支撑。儒学要真正地复兴起来,只有融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儒学之用才能更好地展开。”^①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中国文化的“新传统”,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无疑在现实和历史层面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唯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唯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但是如果离开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也将失去自身的载体和文化土壤。中国传统文化如果忽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带来的深刻变革,其自身的现代转型也势必会成为空中楼阁。一味地强调其中任何一面,要么就是文化的保守主义,要么就是一种

文化的狂妄和自大。诸如此类的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精神,也不符合在人类历史文化交流 and 融合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即一种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相互碰撞中势必会走向文化的融合。总之,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指导意义,绝不是超然的决定性,指导的意蕴不是前者支配后者,而是强调自己的内部结构要产生适应对方的变化。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实践中,我们既要从意识形态的维度摆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要从文化形态的维度辩证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通和互动的同一性关系。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内容和价值理念层面存在多维的融通性和契合性,这是同一性的具体表现。比如:马克思主义与儒家都取“理想主义的态度”,都强调“实践”的重要性,都强调“历史”的观念,都注重从社会关系层面讨论“人”,等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契合性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程度。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契合性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中国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理解、认同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结构,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言:“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③但是,我们绝不能夸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契合性,诸如李约瑟提出的辩证法起源于中国又回到中国的论断显然是夸大了两者之间的契合性和相通性。从矛盾的特殊性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思想形式都有它们的特殊矛盾和

①丁成际:《历史、现状与未来——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研究的三个面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4期。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页。

③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页。

特殊本质。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强调的那样：“每一个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性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性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①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夸大两者的特殊性和对立性，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视为水火不容、非此即彼的关系，似乎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排斥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诸如此类的观点显然是背离了“辩证法的见解”原则。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而言，两者既对立又统一，在这一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中，统一性是主要的方面，对立性则是次要的方面。除此之外，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差异性和对立性过程中，我们既不能夸大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功效，更不能贬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和意义。从总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前现代文化，由于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价值理念已经不适合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需要。我们讲的总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是前现代文化，并不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更不是像李约瑟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博物馆化”，只具有历史的价值，而没有现实的价值。李约瑟所谓的“博物馆化”显然是混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传统”与“儒教中国”之间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派众多，思想异彩纷呈，其中自然不乏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的传统价值理念。

三 从“特殊性”到“普遍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价值诉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是立足于当今中国的现实问题求解，更应该放眼世界，面向未来建构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的生活样式。在这一新生活样式的建构过程中，我们应该努力超越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界限，实现“特殊性”向“普遍性”的时代转变，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念带入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场域之中，以此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在场”。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的那样：“由于事物范围的及其广大，发展的无

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②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应直面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在求解这些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努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转变。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既要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智力和精神支持，也要为解决世界性的现代性问题提供智慧和方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理论实质是什么？有学者认为两者结合的实质是“两个接着说”，既接着马克思主义说，又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说。毫无疑问，从外在表现形式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继承和发展。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两个接着说”的理论宗旨和诉求是什么？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不是目的本身，而仅仅是实现理论当代价值的中间环节，继承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面向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实际，为和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供理论的指引。毋庸置疑，现代化的诉求，仍然是当前中国发展的阶段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西化，这不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现实实践层面都是已经被证实的客观事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开创了人类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另外一条道路。之所以说是另外一条道路，是因为这一条道路至少具备了两个“特殊性”的基因：其一，中国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所在。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传承，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又兼具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质。这一鲜明的特质不仅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新的可能性，也为求解现代性问题提供了可能的答案。什么是现代性问题？这似乎又是一个庞杂的理论问题，在此我们暂不做过多地讨论。简言之，现代性问题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总称，其主要的表现就是社会整体层面的道德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8页。

文化危机和个人层面的无意义感。针对现代性问题,后现代主义给予了回应和批判,但是后现代主义回应和批判的总基调是从理性走向了非理性即感性层面,其结果不但没有解决现代性问题,反而使现代性问题更复杂化与极端化。“后现代主义对感觉原则的推崇同样走向了极端化和片面化,消解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和意义维度,这本身就是现代性问题的实质所在。”^①如果说西方自身孕育的后现代主义没有很好地解决现代性问题,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能为求解现代性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呢?回答自然是肯定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当着我们去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②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强调道德自觉的观念,强调以“和”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准则,特别是儒家强调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③,这些观念对求解现代性问题无疑有积极的作用。也正如汤因比所言:“像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两千年期间所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④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价值诉求是双重的,即求解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的统一。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实现这一双重的价值目标呢?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以何种方式实现自身的当代“出场”呢?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出场自然不能仅仅诉诸诠释学意义上的文化经典重释,而必须面向现实实践和生活世界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传统文化的当代‘出场’与生命重建,不是停留在书斋或典籍的加工整理中就能完成的,而必须从理论上完成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⑤何谓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立足于现实实践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释的过程,创新性发展就是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把创

造性转化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现实实践的过程。也就是说,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其理论内核而言,就是一个“实践—理论—再实践”的逻辑过程。创造性转化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重释,创新性发展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应用,两者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当然,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重释,绝不是书斋式的整理国故或者说诠释学意义上“返本”的功夫,而必须是面向现实实践需要的创造性转化,是面向现实生活世界的重释。作为一种生活的样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存在所谓的“断裂”,也从来就没有“退场”,而是作为一种生活的样式隐匿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之中。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出场”更应该面向现实生活世界,作为一种生活样法加以凸显。中国人之为中国人,不在于种族,不在于户籍,而在于文化层面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样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现实实际结合,用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同时把在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加以概括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成果,更应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构建起中国人特有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在21世纪,中国人应该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是怎样的图景?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就是说,两者的结合应该为我们提供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甚至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生活样式。这种生活的样式无疑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资源,也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马克思对资本与消费社会的批判、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论述等,在此意义而言就具有特别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种新的生活样式自然也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这种人的存在方式不仅仅是现代的,更是中国人特有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不是所谓西方的或者美国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崛起

①李佑新:《走出现代性道德困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8页。

③王海英:《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相通互补》,《理论探讨》2019年第6期。

④池田大作,阿·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国际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276页。

⑤张明:《以历史的眼光审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现代哲学》2020年第2期。

不仅仅是经济和科技的崛起,更应该是文化的崛起,而真正的文化崛起是我们对自己存在方式的肯定和自信,以及他者对我们这一存在方式的认可和向往^①。“现在的中国人如何理解自己的存在方式,是否能够肯定自己的存在方式,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肯定自己的存在方式,这是目前中国人所面临的重大文化抉择和文化考验,是现代中国的自我意识能否真正形成的关键,因而也是现代中国能否走向政治成熟、能否真正崛起的关键。”^②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所维系的生活体系,也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典范,是衡量中国是否能够真正崛起的唯一标准”^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④他的讲话无疑体现了肩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历史使命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要关注现实,体现伟大的时代精神,更要面向未来,建构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生活样式。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才具有更为广阔和深远的价值意蕴。不论是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是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创造自己的新文化。中国人之谓中国人,就应该要对世界说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话,就应该要向世界提供别人没有的东西,就应该要展示具有中国特殊性的生活样法,从而为人类文化的发展贡献我们的智慧和方案。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Mao Zedong's Works *On Practice and On Contradiction*

LIU Yong-ling¹ & LI Wen²

(1. International Confucian Research and Exchange Center, Shan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inan 250002, China;

2.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s classic works *On Practice* and *On Contradiction* have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the realistic need of practice is the fundamental criterion for distinguishing the essence and the dross in traditional culture. There is no good or bad in traditional culture. Only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can we have “cultural immunity” under the premis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adiction, we should dialectically grasp the relationship of unity of opposites between Marx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Unity is the principal aspect of the contradiction, and antagonism is the secondary aspect of contradiction.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should strive to transcend the limitation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own “particularity” and construct a new life style with “universal” meaning, so as to realize the “pre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Marxis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n Practice*; *On Contradiction*

(责任校对 莫秀珍)

①陈青霞:《习近平的中国传统文化观论析》,《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②唐文明:《近忧:文化政治与中国的未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0页。

③唐文明:《近忧:文化政治与中国的未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1—222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页。